

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 理论体系建构^{*}

李 滨 杨蓉荣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理论就是系统地阐述国家对外行为如何导致国际合作与冲突,从国家利益来阐述国家行为的根源。西方主流理论有的是从内部阐述国家行为的根源,有的是从外部结构阐述国家行为的根源,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可以从这三个角度阐述国家利益,分析国际的冲突与合作。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西方主流理论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坚持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历史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生产关系来阐述国家利益的形成,并且强调外部结构与国家是相互决定的结构—施动者之间的关系。就国家内部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认为国家具体历史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具体内容;就外部结构而言,世界秩序的基础是具体的世界性生产体系,而且这种体系具有时代性的结构特征。这种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分析国家利益和世界结构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只有坚持这一方法,我们才能认识国家利益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不同世界秩序的时代性,才能发现不同时代结构—施动者之间具体的互构关系。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世界秩序

【作者简介】 李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驻访学者;杨蓉荣,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 邮编:210023)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17)04-0004-17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一 引言

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引领国际关系的研究,建立中国特色的、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需要努力的方向。国际关系是以研究国际冲突与合作(过去是战争与和平)为主要对象的。什么是国家对外行为的基础?是外部的国际结构还是内部的国家属性,或者两者综合?这是导致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原因。长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有一套主流的理论体系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但主流理论体系都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建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理论体系,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W. Cox)为代表的新葛兰西主义学派等,但它们都不是主流的学术话语。遗憾的是,中国目前还缺乏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基础上的、较为完善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这迫切需要中国学者借鉴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去努力建构自己的理论。本文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与原理勾画出中国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框架,希望以此抛砖引玉,促进中国特色、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构。

客观地说,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有其可取之处,它们从国家属性和国际体系的角度或者从两者结合的角度来分析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由此来解释国际合作与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们对国际体系与国家属性的分析脱离了社会经济基础,尤其是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把国际政治领域视为一个完全自治的(autonomic)领域。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了根本的区别。“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国家、国际体系和跨国权力关系嵌于以……社会生产组织为核心的关系体系之中,并通过这种关系体系而(再)繁殖。”^①以社会生产为基础(或者说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关系体系作为解释国际体系、国家属性从而是国际合作与冲突之根源是鉴别历史唯物主义与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标准。

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展,世界经济对各国内部的经济基础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因此,从一个国家的内部属性来讨论国家的对外行为必须顾及外部结构(世界秩序)的影响,同时,思考世界秩序也必须考察大国内部的社会经济基础对世界秩

^① Martin Griffiths,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7, p.35.

序的建构作用。因此,国家层次的分析必须与体系层次的分析相结合,在这一点上,历史唯物主义与某些西方主流理论是并行不悖的,核心在于是否以国家与国际体系的社会经济结构为基础。要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国家与国际体系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必须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二 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条原则是:生产是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按照这一原理,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建筑在社会生产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

马克思曾对生产作为社会分析基础的原因做过说明。马克思是从最简单的经验假设——人类为了生存就必须生产——开始。这种假设立足于世俗现实与实践,他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②马克思正是把观察点放在了人们最基础的千年不变的经验上,把生产这个最基础的东西抽象出来了。人为了生存就必须生产,生产从最简单的生产开始,逐步社会化、复杂化,形成了各种社会化形态的生产方式。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物质生产是首要对象,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是出发点。^③马克思的这一经验假设不言而喻,最符合科学假设的最基本的条件,即“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④生产是历史的前提没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1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71 页。

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条原则是:必须从具体的社会生产分析具体的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的抽象并不是把所有社会的生产等量齐观,而是把生产这一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社会中,从具体生产透视具体社会。“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生产)……”^①这样的生产已经不是“生产的一般”,而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生产。用“生产的一般”是无法理解具体的社会生产的。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②。因此,任何忽视一般到具体的原则来分析具体的生产(或生产方式)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把所有生产等同化,把具体作为一般来强调,混淆了生产与社会的性质。一些教条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某个阶段的生产一般化,即把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等同化,也是犯了这样的错误。

所以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论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还是建立在社会生产之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它们都是具体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

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③以一般上升到具体为原则,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重要方法。它使得历史唯物主义有了科学实质,“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④

立足于具体、历史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才能避免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化,避开许多强加在马克思主义上的不实指责,如“经济决定论”。从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出发可以发现既存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在新的社会生产中的影响。任何一种新型的生产都不是建立在真空中,而是建立在一定的既存的社会结构之中。既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都会对这种新型的生产产生影响,而既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则是过去生产的产物。所以,马克思曾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8页。

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正是既定条件下,历史的、传统的生产产生的政治与意识影响着新的社会生产,形成了所谓的反作用的表现形式之一。

马克思在分析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时,曾说道:“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②这里马克思充分认识到了历史上的生产和社会结构产生的现实作用,没有把他所经历的资本主义生产对社会的建构作用简单化、单一化,而是看到历史存留的各种社会生产残片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的作用。

按上述逻辑,在分析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时,必须考虑其历史传统的作用,认识到即使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社会也存在着差异性。发达国家如美国与德国、法国的差异就是这种不同的历史传统造成的。

另外,具体、历史地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还必须注意其“综合而不平衡”的状况。任何一种社会生产都不是单一性的,而其中存在着一种发挥主导作用的社会生产,这就是“综合而不平衡”的状态。马克思曾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③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存在公有制经济,也存在其他的非公经济,但它是一种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生产格局。这种“综合而不平衡”的社会生产格局既导致社会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也导致国家的上层建筑与意识的特殊性。

所以,分析具体的社会生产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工作,它需要研究者付出大量的心血进行深入研究。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那样:“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④厘清一个具体的社会生产内在的结构以及各种生产组织形式的内在作用和相互关系也需要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入研究。这对国别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9页。

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原则是实践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是把人的意识作为一种对现实的消极反映论,而是一种基于社会现实的主动实践论。这种能动的实践观来自辩证法。就历史层次而言,辩证法是要从具体的历史场景下各种对立的社会力量冲突中发现社会更替的潜力。^① 历史唯物主义能动的实践论强调,在社会矛盾基础上,人不仅可以认识现实,但不是完全地、消极地适应现实,还可以改变和创造现实。马克思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② 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唯物主义的区别。结合生产是社会的基础这一原则,能动的实践观认为,生产组织方式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下也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会带来历史的变革。这种实践能动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是‘经济决定论’”这一言论的最好驳斥。

总之,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人们必须从具体的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社会表现)去认识社会的政治与文化。任何社会现存的生产都是来自历史,受过去的结构历史影响,这使之呈现出特殊性。任何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都不是单一性的,而是一种“综合与不平衡”发展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也是其特殊性的候症。最后,任何社会经济结构都是人塑造的,没有历史的永恒性。人既是结构的承受者,也是塑造者和改造者,结构和施动者是相互决定的关系。

三 国家对外行为的国内根源

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是什么? 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是国家利益。什么是国家利益? 什么决定了国家利益? 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水岭所在。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上层建筑。社会的生产及其生产关系决定了国家的利益所在,从而决定了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源。哪个阶级在现存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决定了国家的属性及其对外行为。国体是国家的性质,也是具体生产组织方式的社会表现形式(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国家的性质是由国家所依赖的阶级结构所界定的”,这个结构确定了国家的“任务与限度”。但由于“综合与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每个社会都存在着多种生产组织方式,存在

^①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in Robert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1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9页。

着多种阶级。这决定了具体历史时期国家的“任务与限度”不是取决于单一阶级,而是一种“历史的集团(historic bloc)”^①——“国家权力最终依赖的某些社会力量的组合”。^②这种“某些社会力量的组合”就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形态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决定了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的“任务与限度”,它既包括内政也包括外交。国家的内外政策必须服务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方式及背后的社会力量,即使有时这种主导的阶级力量并不是国家的执政力量。19世纪的英国和德国都曾出现这种局面,同时兼顾其他社会生产及其背后的社会力量。因此,分析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是认识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

分析一国的社会经济基础首先必须从具体历史阶段的国家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着手。比如列宁在分析19世纪末资本主义大国的对外关系时,把资本主义民族垄断性(而不是自由竞争)作为其对外政策的经济基础。由于生产的高度集中,金融资本对国内政治经济垄断,垄断资本需要海外商品与原料市场来应对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矛盾,因此,这构成了它们的国家利益,决定了此时资本主义大国的对外行为是争夺海外殖民地与势力范围以及由此带来的帝国主义战争政策。^③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着手,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由于生产国际化、资本的跨国化,彼此之间的生产高度融合,共同控制着世界市场,因此,这成为它们共同对付发展中国家而彼此高度协调的经济基础。^④

其次,从国内社会基础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还必须考察历史传统和“综合与不平衡”状态给国家对外行为带来的影响,即考虑其特殊性。列宁在分析19世纪末资本主义大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时,既看到了它们垄断资本主义的共性,也充分地考虑到了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历史传统与内部发展不平衡及其综合性带来的特殊性。有人依据列宁的分析,把英国称为殖民帝国主义、法国是高利贷帝国主义、德国是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美国是托拉斯帝国主义、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⑤就是对当时的帝国主义国家特殊性的分析。当今由于这些国家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很少有人再用殖民帝国主义来形容英国、用高利贷帝国主义来形容法国、用容克资产阶级

①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

②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s*, p.105.

③ 《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688页。

④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19-325.

⑤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中指出,英国是殖民帝国主义,法国是高利贷帝国主义。参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629页。有人依据列宁对一系列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析,把德国称作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美国是托拉斯帝国主义、俄国(包括日本)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参见 <http://wenwen.sogou.com/z/q176955800.htm>,访问时间:2017年2月21日。

帝国主义来形容德国,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特殊性仍然存在,分析其对外行为时必须考察其当代的特殊性。

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利益,要以国家内部的经济基础为出发点。这个经济基础是具体的历史阶段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由历史传统与不平衡发展带来的综合性、特殊性。任何抽象的、脱离历史阶段的、缺乏特殊性的经济基础分析都是教条的。这对于从事国别外交政策研究的学者特别重要。比如,分析当今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对外行为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出发点,以此来分析当今中国和平与发展外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当今中国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已经从计划组织转变为市场调配,从单纯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形式变化到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这其中包含了历史传承因素以及综合与不平衡发展因素。分析当今中国外交应当深入地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各阶级(层)的诉求和这种诉求在对外交往中的表现。因此,绝不能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外交裁量当今的中国外交,因为两者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国家层面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分析从根本上缺乏对国家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更谈不上对国家历史的、具体的、特殊性的经济基础的分析。以自由主义为例,它从国内属性来分析国家对外行为时就不是从历史具体的社会生产出发。“民主国家不打仗”就是一种典型代表。这里国家的民主属性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形式上的,以普选和三权分立为特征。只要国家政治特征大体符合这些要求,这样的国家对外行为往往是和平的,特别是对同样是“民主”国家的外交是和平的。古典现实主义从国家内在属性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时,把国家拟人化,把国家对外行为建立在千年不变的人性上,^①强调国家与人一样是(超历史的)“政治动物”,同样也不分析国家对外行为内在的经济基础。虽然古典主义者正确地认识到国家对外行为是追求利益所界定的权力,利益是不能赋予一个永久固定的含义的,^②但他们没有认识到造成这种利益非固定的基础是可以变化的社会经济结构,权力来自以社会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新现实主义更是离开社会经济基础,通过无政府结构把国家同质化。^③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往往不从社会经济基础谈国家利益的认知起源,或者把利益认知作为一种外在给定的东西,从理论上或者回避利益的产生与认知过程,或者

①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②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13页。

③ 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强调利益是一种学习的产物,是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建构并传播的结果。^①前者完全排除了社会经济基础对利益产生的决定作用,后者只注重知识分子/专家或决策者的认知作用,没有认识到经济基础带来的利益影响对认知共同体的作用。比如在经济全球化中,美国传统的产业工人如果不是在这一过程中既得利益受损,反全球化的政客和知识分子再大的煽动也无法激起其对全球化的排斥心理。即使认知共同体建构出来的利益也无法离开他们对由社会生产带来的社会运行结果(客观世界)产生的判断,他们也是所认知世界的一分子,主客观往往是难以分离的。问题是他们的利益观代表了谁。只有认识到是谁的话语结构下产生的利益建构,才可以在具体情形下从国家对外行为追求目标上发现其适当性(适当理性),从对外行为的结果上来判断其(工具)理性,从实现利益的过程中发现其实践的务实性(实践理性,即妥协、折中、对抗、强迫等手段依据能力的恰如其分且灵活地应用)。离开社会经济基础来谈国家对外行为的适当理性、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都是抽象的一般而没有上升到具体的表现。

因此,国家对外行为的基础——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即具体的、历史的且具有特殊性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社会表现(社会生产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利益是不能赋予一个永久固定的含义”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固定不变的。有人说,领土主权是国家不变的国家利益。这并不能排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分析的基础作用。因为领土以及领土上可能带有的自然资源是生产资料的构成,是任何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也是任何社会生产不可缺少的自然载体。越是依赖它进行生产、生活的人,对领土主权的要求就越强烈,加之建立在过去生产组织方式上建构起来的领土归属文化的传承加强了领土主权是国家不变的利益的思维,因此,从这个角度说,领土构成了国家利益固定不变的东西。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也可以解释另一个常用的国际关系概念——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就是维护国家利益不受侵犯。它从根本上来讲就是维护国家现有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即维护建立在经济基础上整体的社会秩序。从这个角度来看,近来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性。

总体国家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即促进社会生产造就的社会阶级基础;以政治安

^① 有关西方主流理论对利益起源的分析,参见 Andreas Hasenclever, et al.,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2-152。

全为根本,即保卫社会经济基础造就的政治制度;以经济安全为基础,即保障当今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顺利运行;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即国家在军事上能防范外部军事入侵,文化上能免于外部侵蚀,社会能保持稳定;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即以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自己国家安全的外在条件。^①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保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社会秩序为根本前提。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一个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尤为重要,因为它的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和社会秩序都处于一个不太相容的外部世界环境中。

然而,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孤立的、封闭的,它受到世界秩序的重大影响。这与资本主义世界性的拓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近代中国,由于外部资本主义强制进入中国,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产生了新的阶级成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这使中国的社会性质从封建社会演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及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模式。自世界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一国的“生产、阶级与历史集团不是以孤立的民族区间存在的,它们与直接影响它们的世界秩序是联系的,世界秩序也可以通过民族国家来影响着它们”,特别是在一个霸权世界秩序下。^②因此,世界体系对国家的对外行为发生了重大结构作用,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利益离不开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借鉴西方的体系理论,但关键是我们的体系论必须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 analysis 基础上。

四 世界秩序与国家的对外行为

世界秩序是世界性经济与政治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形成的整体结构。世界范围内主导的生产方式是世界秩序的经济基础,在某种具有主导性的历史具体的生产组织方式下,通过贸易和投资对国际/全球经济进行了整合,由此形成一种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度安排,对世界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做了一定的规范,这种规范以某种意识形态作为其合理解释,以某种国际权力机制作为使规范得到遵守的最后强制力量和国际稳定(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力量。不同的世界性主导的生产组织方式使世界秩序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它的变化带来世界秩序实质内容的变化,如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规定性的变化,意识形态

① 总体国家安全观表述,参见 http://guoqing.china.com.cn/node_7204306.htm, 访问时间:2017年2月28日。

②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s: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pp.6-7.

的变化以及国际权力机制和国际秩序的变化。

稳定的世界秩序是一种霸权的秩序,它带来了世界范围的相对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其意识形态获得较为广泛的认同,整个秩序较少通过武力来维持,而是通过有形或无形的制度来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大体得到维持。19世纪中期、两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以及8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大体是霸权的世界秩序阶段。而混乱的世界秩序是一种非霸权的秩序,它没有一个获得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具有约束性,各国主要受国内经济基础的支配,整个世界往往处于一种动荡与冲突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就是典型的非霸权世界秩序阶段。可以说,霸权世界秩序下,国家的对外行为受外部世界秩序的结构影响较大,而非霸权时代,国家对外行为受外部的结构性影响较弱,更多地受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影响。

世界秩序最深厚的基础是什么?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仍然是世界性的生产组织方式。但是,如何研究世界性生产体系及其社会表现形式显然比国内要复杂得多。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及国际生产关系这一问题(这一词被译成了“生产的国际关系”)。但马克思在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没有对当时的国际生产关系进行较深入的分析。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对国际生产做了一定分析,提到了工业与农业分工导致了世界城市对农村的支配,工业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支配,西方对东方的支配。^① 这一分析被许多的左翼理论使用,如世界体系理论、结构主义理论、依附理论等。它们把国家与民族在国际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作为一种标准来进行阶级分析,中心与外围就是其表现。这种分析的单元是国家与民族,而不是更深入的社会群体。依附是对不发达民族在国际生产体系中地位的最贴切的描述。除了这种国际阶级分析之外,还有一种是整体的、超越国家的全球性阶级分析。如考克斯指出,“各国的生产通过世界的各种机制联系起来,连成了世界生产体系;领导国的各社会阶级在其他国家的阶级中可以找到同盟”;“各国的历史集团……通过其相互利益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进而开始形成全球阶级;一个围绕着国际体系的初始的世界社会成长起来,而各国变得国际化了,因为它们机制和政策适应了世界秩序节奏”。^② 这种阶级分析不是以国家与民族作为世界性阶级分析的基本单元,而是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全球生产中的地位作为阶级分析的单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6—277页。

②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s: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pp.6-7.

上述阶级分析不论哪一个都是建立在国际/世界生产体系基础上的。但是,如何体现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组织方式的时代性、具体性和特殊性,则需要结合当时的生产组织方式的特点进行认真探讨。如果把马克思时代的国际生产、列宁时代的国际生产与当今生产全球化等同起来,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提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

具体地分析世界秩序经济基础就离不开对结构与施动者这一相互建构的关系进行探讨。任何具体历史阶段的世界秩序都是人创造的,都是霸权国家及其内部占领导地位的社会力量塑造的。正是这种施动者的历史塑造带来了世界结构的历史阶段性和特殊性。19世纪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是由英国及其领导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建立的,体现的是英国社会自由放任秩序的特征。战后的世界秩序是由美国及其垄断资本力量建立的,体现了新政的特征。这些特征都带着这两国经济基础的印迹。当今的生产全球化也与美国这个具有生产国际化传统的国家密切联系着,带着美国的特色。过去英国主宰的世界秩序,英国是世界工厂,主导着国际分工,从而呈现一种以工业资本主义生产为主导的社会生产,其他各种社会生产(如庄园农业)都依附于它,形成了一种国际生产分工。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以垄断企业为主导,其他社会生产(如自由竞争)依附于它,形成了一种国际生产结构。冷战结束后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其经济基础是跨国资本主导的生产全球化。它源自(主要是)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外包等方式,通过跨国生产链把各种其他社会生产嫁接其中,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生产结构。在这些世界生产结构中,都可以发现主导与非主导社会生产同时存在的“综合与不平衡”状态。这些是世界秩序历史阶段性和特殊性的经济基础。只有从结构被塑造的过程中,才能发现世界秩序历史具体的特点,才能发现它们对国家行为不同的结构约束。

世界秩序对国家行为的结构性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从世界经济对国内社会经济基础的影响,从而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来考察;二是从世界秩序产生的政治竞争对国家的影响来考察。

由于近代以来,不同的国家通过分工卷入国际/全球生产结构中,形成了连接或依附于世界经济的国内经济成分,这对国家内部的社会生产关系产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影响,影响着国家行为的“任务与限度”。依附理论的作家之一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资本主义支配着一切,不发达国家的国内结构也是由这一体系决定的,是世界依附关系延伸的产物。尽管各个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结构存在着特殊性,但都有共性,即国际资本与国内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形成特

定的联盟进而维持不发达的状况,对内共同防止不发达国家出现旨在实现真正独立的民族民主革命,对外在国际舞台上追随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① 考克斯则用“国家的国际化”解释国际/全球生产结构对国内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通过这种影响从而导致国家对外行为适应于外部的结构。^② 这些外部对国内社会生产关系影响的解释主要强调,各国生产与国际/全球生产的联系导致国内出现追随世界秩序的社会阶级基础,如果这些社会力量成为国家领导的阶级力量,国家必然按世界秩序的节奏形成自己的对外行为。

世界秩序存在着政治竞争。犹如国内生产组织一样,谁主导生产与分工,谁就具有社会性权力,谁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这种政治竞争在国内生产中不仅存在于资本与劳动之间,也存在于资本之间。在世界经济体系内,同样存在着政治竞争机制。沃勒斯坦曾分析过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的这种竞争机制,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不仅是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形成政治竞争的重要条件。各类国家都交替地应用经济战略与国家权力获取世界经济中的盈余以发展自己。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国家间的政治经济竞争。由于发达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经济竞争中的能力,使得这一体系的分工格局不仅通过世界市场交换实现,而且也通过核心地区经常性地对边缘地区施加政治强制实现。正是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从这一体系生产关系中获得了主导地位。同时,这也产生了一种政治竞争的国际均势机制,为了争夺积累,各大国力图也通过政治竞争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积累。均势机制就是使任何大国无法单独以世界帝国的形式独占世界经济中的盈余,改变既定的体系分工和交换方式。^③ 沃勒斯坦的分析虽然立足于社会经济基础,类似于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但是主要以国家疆域内的生产(或者说民族国家化生产)然后通过国际交换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为基础,对二战以前的国际关系可以说是有一定的客观性,而对当今以全球生产链为特征的全球分工体系是否有效仍存在疑问。另外,这种分析是否还存在结构固化的问题也值得探讨。

当今经济全球化形成的跨国生产组织方式正改变着传统的民族国家化生产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资本的跨国利益,造就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① Dos Santos, “Structure of Depen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 No.2, 1970, pp.231-236. 多斯桑托斯与一些“依附论”作家所不同的是,他认为依附不仅源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因素,而且国内因素受制于国际因素也是形成依附的一个重要方面。

②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230.

③ 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33 页。

的利益融合。在这种条件下,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大国的政治竞争与帝国主义战争已经失去了经济基础,因为跨国垄断资本已经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全球生产、金融的网络和全球市场,并成为这个市场的主宰,资本不需要国家为它获得排他性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因为帝国主义建立起来的排他性市场已经不符合全球性垄断资本的特点,它只能造成全球市场的分割化,而且由此产生的帝国主义政治竞争与战争会破坏世界市场的正常运作。^① 因此,过去国际经济体系产生的均势权力制衡机制对资本主义大国来说似乎作用已经不大,更多地体现着一种“超帝国主义”的特征,即通过代表全球资本的一种全球警察力量来维护世界秩序(这个警察力量现在主要由冷战遗留下来的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来担任),资本主义大国间存在着高度的政治经济协调,共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控制。

但是,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还不能说权力制衡机制完全失效。这种机制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主要大国与非西方大国之间。冷战结束前后,虽然非西方大国如中俄两国已经不同程度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但它们并不是完全融入,而是在各个领域不同程度地选择性地融入,经济上如此,政治、意识形态与军事上更是如此。这也是当今世界经济“综合与不平衡”的表现之一。因此,世界秩序的领导阶级、拥趸者及其主要代表国家总是对这些非西方大国心存狐疑,希望把这类非西方大国改造成“合格的成员”。权力制衡成为西方大国改造战略的一个部分,如针对俄罗斯的北约东扩、东亚针对中国的军事联盟再改造等。因为在现代军事条件下,现代武器的杀伤力已经超越了跨国资本的承受力,经济依存关系已经造成了战争的两败俱伤的现实性。通过国际权力制衡压缩非西方大国的战略空间,遏制其国际影响,控制其发展节奏,是一种最经济、最现实的战略。而作为非西方大国,在这种世界秩序中面临着社会经济政治体制重大生存威胁。结构性威胁促使一些非西方大国有时本能地不得不采取反制衡战略。这种权力制衡机制从根本上仍然是来自世界秩序的社会经济基础。

因此,在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下,各国在其中的地位造就了各国的身份感,国家的身份感源自国内经济基础的构成以及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国家的身份感决定着各国对外行为的“可能性条件”。从这个角度来谈外部结构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才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质。

西方的主流国际关系结构理论在谈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时,并不是从世界体系的社会经济基础出发的,而是从一般抽象的“无政府状态”出发。这种结构理论把无

^①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pp.3-21, pp.219-325.

政府状态作为一种政治结构,存在于其中的国家为了生存安全与自决,必然地进行权力制衡,或表现为维持现状的防守性现实主义,^①或表现为先发制人的进攻性现实主义。^②这种结构理论都是把国际关系视为一个自治的政治领域,缺少作为基础性作用的国际/世界经济成分的分析。抽去了社会经济基础,任何历史阶段的世界结构都是相同的,历史特色鲜明的国际关系史成了“历史循环”,这就回到了马克思批判过的用“抽象的一般”来解释社会经济的“同义反复”窠臼中。同时,这种理论由于缺乏社会经济基础的分析,就少了对施动者对结构建构的分析,无政府状态成为缺乏历史创造主体的空洞“结构”,世界秩序就失去了实质性的内容。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也是某种结构理论。它的原理论思维与新现实主义一样:无政府的结构决定了自利国家为了绝对收益的增加、为了避免集体行动的困难所产生的次优结果,从而建立起国际制度;这样的制度导致了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结构性约束作用,使得国家的对外行为趋于合作。^③这种理论尽管是从内部来认识国家行为的动机,似乎也注意了施动者与结构之间的互构关系,但从根本上也是采用了无政府状态这一“抽象的一般”来解释具体现实的方法,这与新现实主义在结构分析上是一样的。在内部利益的认知分析上,虽然这种理论后来补充了学习与认知共同体的作用,但没有分析社会经济基础带来的利益影响对学习和认知的作用。

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讨论结构对国家的影响时,不能消极看待结构的作用,应该从环境与人的关系来认识施动者—结构的关系,必须认识到施动者的能动作用。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认识结构与施动者的关系,就可以走出结构决定的宿命论,发现国家在结构下的实践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多样性。新古典现实主义突破了结构现实主义的机械论,认识到国家在外部结构影响下的反应多样性。如兰德·施维勒(Randall Schweller)和戴维·普里斯(David Priess)就强调,结构并不是导致大国冲突与制衡的唯一原因,国内政治、国家间的相互作用是国家对外政策不同的因果分析变量,它们相互作用影响着国家的对外行为,这种结构、相互作用与国内政治的共同作用不一定导致制衡的对外行为。^④虽然新古典现实主义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分析这种非宿命的结构作用,但它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即如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结合国内

① 防守性现实主义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其代表作品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1992年版。

② 进攻性现实主义以约翰·米尔斯海默为代表,其代表性作品参见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③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其代表性作品参见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 Randall Schweller and David Priess, “A Tale of Two Realisms: Expanding the Institutions Debate,”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41, No.1, 1997, p.14.

的具体社会经济基础来分析国家在外部的压力下做出对外反应。中国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面对外部世界的结构性制衡压力,中国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种主张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共同作用下产生的“限度与任务”所决定的。这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特殊的经济基础的作用,也有当今经济全球化造就的世界秩序的作用。这一切恐怕是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结构理论无法解释的。如果沉溺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思维,或导致中国走向全面与美国的军事对抗,或导致全面顺从世界秩序的“合作”。这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来说都将是悲剧性的结果。要摆脱这种局面,首先就要从西方主流理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20世纪的中国外交也已经对西方主流的结构宿命论进行了证伪。有中国学者曾经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进行过研究,指出中国整个20世纪在无力主导世界变化的条件下,总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己,从而影响世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影响总是有限的,中国的对外行为并不完全是外部结构决定的。^①

走出结构决定的宿命,必须认识到结构是施动者的创造物,被人创造出来的结构并不是永恒的、不可改造的。施动者对结构的改造依赖于施动者的物质能力,依赖于施动者的反思能力与创造性思维。自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从英国到美国的主宰更替就体现了这种施动者对旧结构的改变。历史走向今天,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带来的巨大社会危机与矛盾面前,人类也在反思。如何推动世界秩序向公平、合理、安全的方向发展,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正在考验着人类的能动性。习近平提出“两个引导”,即“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在2016年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历史是勇敢者创造的,这些都体现出一种摆脱宿命、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创造美好世界的决心与勇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带来的物质能力巨大提升,带来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加之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种种弊端与危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现实,使得引导世界向公平、合理和共同安全的新结构发展存在着现实的可能性。如果囿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只会因循守旧,畏缩不前。因为西方主流的带有结构宿命的理论是一种维持现状的理论,它无法引导世界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只有带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质的理论才能引导世界走向美好的明天。

^①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4—19页。

五 结语

国家对外行为受到国内结构和外部结构双重决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用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基础来分析国内的结构和国际结构。这是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根本的区别之处。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世界秩序的社会经济基础受历史传统影响,而且呈现出综合与不平衡的状态,使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内结构与世界外部结构呈现出特殊性,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从各个阶段抽象出来的具体概念范畴必须从一般上升到具体。没有这种具体的分析就无法理解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际/世界秩序等概念的历史具体内容,也无法理解国家对外行为的历史具体性,更无法理解国际合作与冲突不同历史阶段的交替性。西方主流理论把政治作为一个自治的领域,把国家、世界结构同质化。这既违反了历史事实,也无法理解国家的多样性和历史的时代特征,造成了一种宿命的历史观,目的是维持现状。“理论永远是为了某种目的,为了某些人。”^①中国人需要自己的理论,中国的国家属性决定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引领,服务于中国的发展,服务于推动世界秩序向公正合理和共同安全方向发展。目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落后于中国的外交实践,特别是落后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特质、兼收国外理论精华的理论。

(截稿:2017年2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p.207.